



列宁

高尔基著

出版说明

本书初稿发表于一九二四年春天。这年二月四日，高尔基写信给他的妻子安德烈耶娃，说他写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信中充满对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逝世的哀痛。当时，这篇回忆录原稿的题目是《人》。同年，稍加删节，改用《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个题目发表在《俄罗斯同时代人》杂志第一期上。在一九二七年苏联书籍社出版的高尔基《回忆·短篇小说·随笔》和一九二八年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选集第二十卷里，也收入了这篇回忆录。但是作者本人对这篇回忆录并不满意。一九三〇年，高尔基对原文作了修改，大大扩充了内容，更详尽地叙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描写了他和列宁在喀普里和巴黎的会晤，说明了自己在一九一八年所犯错误的原因。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七卷译出的。

列 宁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36,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 \frac{1}{2}$ 插 页 1

1957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11 月 北 京 第 2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671

定 价 0.20 元

列 宁

高尔基著
曹葆华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В. И. Ленин

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7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译出。



列宁和高尔基
彼得格勒 一九二〇年

弗拉基米尔·列宁逝世了。

甚至他的敌人阵营里也有些人坦白地承认：列宁逝世后，世界上失掉了一个“在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间最有天才”的人物。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布拉格日报》刊载了一篇有关列宁的文章，对这位巨人充满着崇敬的惊奇心情，文章结尾写道：

“列宁就是在死后也是伟大、无比崇高和令人生畏的。”

从这篇文章的语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写这篇东西的动机，并不是象“敌人的尸体总是香的”这句玩世不恭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出于生理上的满足，也不是出于人们在一个极不安分的人离开他们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愉快，——不，在这篇文章里洋溢着以人为荣的人类的自豪感。

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在评价这个生活意志和坚强理性的最伟大的体现者的时候，尚且表示了敬意，而俄国

侨民的报纸则既没有魄力，也不知分寸，它们对列宁的逝世就连这样的敬意也没有表示。

要给他画像是困难的。从表面上来说，听到列宁的话就知道他整个的人，正如看见鳞就知道是鱼一样。他是朴素和率直的，就象他说的话一样。

他的英雄主义几乎完全没有表面的光华，他的英雄主义是一种在俄国常见的、坚信世上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的正直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谦逊刻苦的献身精神，是一种摈弃世界上的一切享乐而为人类幸福从事艰苦工作的人们的英雄主义。

我在他逝世后不久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下写成的，既潦草，又蹩脚。为了“有分寸”的原故，有一些话我当时不能写出来，我希望能得到充分的谅解。列宁这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力和伟大的智慧，然而“巨大的智慧包含着巨大的悲痛”。

他是高瞻远瞩的，他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考察、评论人们的时候，常常正确地预测到他们在几年以后将成为怎样的人。我并不总是愿意相信他的预见，这些预见也往往令人沮丧，可是遗憾的是，有不少的人却证实了他的怀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以前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除了写得不好以外，还写得前后不连贯，而且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疏漏。我应当从伦敦代表

大会^① 那些日子写起，那时候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一些人怀疑和猜忌，同时被另一些人公开地敌视，甚至憎恨。

我迄今还清楚地看见伦敦郊外那座简陋得可笑的木头修造的教堂的光秃秃的墙壁，那类似穷学校教室的又小又窄的厅堂的箭形的窗户。这座建筑仅仅在外表上象一个教堂，里头却根本没有做礼拜用的东西，甚至传教士的矮小的讲台也没有安置在厅堂深处的前面，而是放在进口的地方，在两道门之间。

在这一年之前，我没有见过列宁，也没有好好地多读他的著作。但是我读过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直接认识他的同志的热情的叙述，都使他以巨大的力量吸引着我。当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我，以老相识的口吻诙谐地说：

“您来了，这好极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干一场。”

我所预料的列宁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缺少什么东西。他说话时字母“P”“Л”发音不清，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我是

① 指一九〇七年五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一个文学工作者。这个职业逼着我注意琐细的事情，这个职务已经变成习惯了，有时简直令人感到厌烦。

当我被“引见”给格·瓦·普列汉诺夫^①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看着我，有点厌烦，好象一个教书教厌了的教师又看到了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很敬仰您的才能。”除此以外，他不曾说过一句能印在我脑海中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他，还是我，谁都不想“推心置腹”地交谈。

但是这个秃头的、说话时字母“P”“Л”发音不清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②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已经从伊·彼·拉迪日尼柯夫^③那里把手稿拿去读过了。我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能赶写出来就很好，这是

① 普列汉诺夫(1856—1918)，七十年代是民粹主义者；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首领。

②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哲学家。

③ 拉迪日尼柯夫(1874—1945)，布尔什维克，苏联出版工作者，高尔基的朋友。

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唯一的赞语，然而对我却极其珍贵。接着他郑重其事地问我：《母亲》是否译成外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等到他知道作者受到通缉的时候，他先是皱皱眉头，接着仰起头来，闭上眼睛，异乎寻常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吸引了工人们，好象是福马·乌拉尔斯基和其他两三个人走了过来。

我当时真是兴高采烈，我置身于三百名优秀党员之中，知道他们是被十五万有组织的工人派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亲眼看见了党的所有的领袖、老革命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①、捷奇^②。我兴高采烈的心情是毫不足怪的，而且也会被读者所理解，只要他们知道在侨居国外的两年中我的情绪总是十分低落的话。

我的情绪低落是从柏林开始的，在那里我差不多

① 阿克雪里罗德(1850—1928)，曾参加劳动解放社，后堕落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首领。

② 捷奇(1855—1941)，曾参加劳动解放社，后堕落为孟什维克。

会见了社会民主党所有最重要的领袖，我在奥古斯特·倍倍尔^①家里吃过饭，坐在肥胖的辛格尔^②旁边，周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一所宽敞而又舒适的住宅，几个画眉鸟笼雅致地披着绣花的罩布，安乐椅靠背上也盖着绣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子上的人用颈背弄脏了椅套。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很结实、牢固，大家一本正经地吃着饭，而且一本正经地互相说道：

“马尔采特^③。”

这个词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法文“马尔”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时代”，这样一来，就是“糟糕的时代”。

辛格尔两次把考茨基^④称作“我的浪漫主义者”。倍倍尔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些自满。我们喝莱茵酒和啤酒，莱茵酒味酸而柔和，啤酒清香可口；谈到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也是酸溜溜的、不以为然的，然而谈到自己的德国的党——那可是太好啦！

① 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

② 辛格尔(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

③ 德文，意为：请吧。

④ 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总之，一切都是很自满的，好象那些椅子也由于能够承受领袖们如此尊贵的躯体而心满意足似的。

我和德国党之间有过一件“微妙”的事情：该党的一名重要党员，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巴尔乌斯^①，从知识社^②得到一份委托书去各个剧院收集《在底层》的上演税。他是在一九〇二年秘密到塞瓦斯托波尔^③的时候在火车站上得到这份委托书的。他收集到的钱将这样分配：他得总数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再作如下分配：四分之一归我，四分之三充作社会民主工党的经费。当然，这个条件巴尔乌斯是知道的，甚至他还非常高兴。在四年中间，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轮流上演，只在柏林一个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场，巴尔乌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万马克。但是，他不把款项给知识社寄去，却寄给该社的康·彼·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在信里老实地通知说：他同一位小姐到意大利旅行了一趟，把所有这些钱都花光了。因为这次想必是十分愉快的旅行，跟我个人有关的只是这笔钱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有权向德国党中央提出关于其余的四分之

① 巴尔乌斯(1869—1924)，俄国侨民。曾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堕落为德帝国主义的间谍。

② 知识社是高尔基创办的一个出版社。

③ 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一个城市。

三的问题。我是通过伊·彼·拉迪日尼柯夫提出的。但是该党中央对于巴尔乌斯的旅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听说巴尔乌斯被撤销了在党内的某些职位——说良心话，我倒是希望人家揪他的耳朵。后来，在巴黎有人指给我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太太，说巴尔乌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宝贝！”我这样想，“宝贝。”

我在柏林看见了一些文学家、美术家、文艺鉴赏家和其他的人，他们彼此间的区别只是自满和自我欣赏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时常看见一心想作纽约的市长或州长的莫里斯·赫尔基特^①，还有孤独而疲惫地咒骂一切人和一切事的德布斯^②老头子（他刚刚出狱），我看到很多的人和很多的事，但是没有遇见过一个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我到处都觉得大家把俄国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这个国家里的普通现象，照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女士”的说法，

① 赫尔基特（1869—1933），曾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后堕落为反革命。

② 德布斯（1855—1926），美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反战而入狱，一九二一年出狱后改变了过去的政治态度。

在这个国家里，“通常不是霍乱就是革命”。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维克募集经费的这个想法，是列·波·克拉辛^①提出来的；弗·弗·沃罗夫斯基^②本来要作为秘书和演讲会的组织者同我一道去，他精通英文，但是党给了他什么别的任务，于是布勒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直属的战斗小组组员）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哑巴”，在路上才开始学英文，到了美国还在学。社会革命党人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就对这次旅行发生了年青人那样强烈的兴趣；还在芬兰的时候，恰科夫斯基就同西特罗夫斯基一起来看我，劝我不要为布尔什维克而要“一般地为革命”募款。我拒绝了“一般地为革命”募款。于是他们派遣“老祖母”^③到那里去，这样一来，在美国人面前就出现了两批人，他们各不相干，互不见面，而且显然是为着两个不同的革命开始募起款来；至于哪一个革命更好，更可靠，——美国人当然是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致去考虑的。看来他们早就知道“老祖母”了，她的美国朋友们为她作了很好的

① 克拉辛(1870—1926)，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苏联驻英和驻法大使。

② 沃罗夫斯基(1871—1923)，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外交家。

③ 指布里希可—布里希可夫斯卡雅(1844—1934)，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称她为“俄国革命的老祖母”，后堕落为反革命。

宣传，而沙皇的大使馆却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侮辱^①。美国的同志们也认为俄国革命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事情”，所以在处理我从群众大会上募集来的款项时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态度。我只募集到很少的钱，还不到一万美元。我决定在报纸上“赚几文钱”，但是在美国也有巴尔乌斯这样的人。总之，这一次旅行是失败了，但是我在那里写成了《母亲》，这也是造成这本书里的若干“疏漏”、缺点的原因。

以后我到意大利去，住在喀普里^②，埋头阅读俄国的报纸和书籍，——这也使我的情绪大为低落。如果一颗从牙床上拔下来的牙齿能有感觉的话，那它大概会感到自己象我一样孤独。一些熟人从这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上去的那种小丑似的敏捷和灵巧，实在令人惊讶。

从俄国跑来了一些投机的革命家，他们吃了败仗，惊慌失措，咒骂自己和那些把他们拖进“绝望的事业”中去的人们。

① 一九〇六年四月间，高尔基抵达纽约。沙皇政府驻美大使馆收买美国黄色报纸诋毁高尔基，说玛·费·安德烈耶娃不是他的“合法”妻子，结果，他们被赶出旅馆。

② 喀普里岛是意大利的疗养地。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三年，高尔基曾在该岛居住。

“一切都完了，”他们说，“一切都被打垮了，扑灭了，放逐了，关进监狱里了！”

有很多可笑的事，但是没有一件愉快的事。从俄国来了一位客人——一位文学家，而且是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说我仿佛扮演着《在底层》里的鲁卡这个角色：向青年们讲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他们相信了我，结果碰了钉子，而我却跑掉了。另一位客人硬说我被“潮流”吞没了，说我是一个“毫无出息的人”，说我否认芭蕾舞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是“皇家的”。总之，有非常多可笑的、愚蠢的事情，常常使我觉得从俄国刮来了一股腐朽的尘土。

突然之间，象在童话里似的，我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这当然令人兴高采烈啦！

但是我的兴高采烈只到第一次会议为止，只到“议事日程”问题的争论为止。这些争论的激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发现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于弗·伊·列宁怀着敌意。这种敌意从他们的演说里泄漏和喷射出来，好象水在高压之下从一条旧的“水龙带”里泄漏和喷射出来一样。

说些什么，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往往是怎么说。